

○学术研究部分（中）○

巫山历史文化研究

滕新才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山历史文化研究 / 腾新才主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9-05867-8

I. ①巫… II. ①腾… III. ①文化史—重庆市—文集
IV. ①K297.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3095号

巫山历史文化研究

W U S H A N L I S H I W E N H U A Y A N J I U

腾新才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袁 宁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 陈 永 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36 字数: 710千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67-8

定价: 1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巫山历史文化研究》收录研究巫山历史、文化的学术论文(含校注)52篇,分《巫山历史》、《巫山文化》二部,抉微阐幽,圆融博观,揭橥(zhū)巫山人文社会的发展轨迹。

一 源远流长的巫山历史

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是指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大领域;狭义的历史则专指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历程。然则所谓历史,是人类社会过去的事情和行为,以及对这些事件和行动有系统有目的的记录、诠释和研究。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一是“历史”,一是“历史学”。前者是已经过去、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后者——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并不断完善,有时可能会出现歪曲历史、捏造事实的伪科学。去伪存真,秉笔直书,尽而不汙,惩恶劝善,是中国史学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国这样重视历史科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的治学路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2]的价值取向,“鉴古而知今”^[3]、“彰往而察来”^[4]的人生智慧,将中国史学传世、资政、教化、悟道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到“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5]的高度。所以法国学者弗朗瓦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说:“关于历史学,这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伦比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6]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1820—1895)更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宣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

学,即历史科学。”^[7]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以一种敬畏的情绪去认识历史,不得不以十分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科学。

用这样的历史观来观照巫山历史,我们为之惊叹不已!巫山,这块神奇的土地,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考古学家揭示:距今204万—201万年前的巫山龙骨坡猿人、距今6400—5300年前的巫山大溪文化,证明早在早期猿人时代、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即有远古人类生息繁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

历史学家的思维模式与考古学家有所区别。考古工作不仅需要渊海的知识,还需要丰富的想象,犹如一名优秀导演,能够从残垣断壁中看到唐朝的恢弘殿堂、从破布乱麻中瞅见汉代的精美图画、从危石碎砖中仰望战国的雄伟长城、从残篇断简中嗅出魏晋的潇洒风度……史学研究却不是如此这般的潇洒浪漫,更多的是需要冷静与理性、客观与实证,固守书斋,皓首穷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8],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1893—1969)这句名言,道出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的艰辛与执著。

(一)《山海经》研究

本书收录蒙文通先生(1894—1968)、任乃强先生(1894—1989)、袁珂先生(1916—2001)、董其祥先生(1924—1991)研究巫山历史的大作,他们都是“蜀学”派的名家,深受晚清廖平(1852—1932)、宋育仁(1857—1931)等宗师的影响,弘扬了自宋代苏轼(1037—1101)开创“蜀学”以来,包括三苏、周敦颐(1017—1073)、程颐(1033—1107)及其在蜀后学张栻(1133—1180)、度正(1166—1235)、魏了翁(1178—1237)等融汇蜀洛、贯通三教的学术传统。其中董其祥先生虽然1951年以后一直在重庆市博物馆工作,但早年受业于四川大学徐中舒(1898—1991)、冯汉骥(1899—1977)、邓少琴(1897—1990)诸先生门下,亦是“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关注《山海经》的研究。

《山海经》实在是一部奇书,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隋书·经籍志》以后多归入地理书,按照古代文献“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地理书均属史部。

蒙文通先生首倡《山海经》研究新思路、新方法,为以后学者正确认识巴国作品拓展了新视野。他发现《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以巴、蜀、荆楚地区为“天下之中”的,其《海内经》和《大荒经》则是以今川西地区为“天下之中”。《大荒经》五篇,曾四次提到“巫山”,这是《山海经》其余两



部分所不见的;同时《山海经》中关于“巴国”、“巴人”的记载,也仅见于这部分,于是得出结论:《大荒经》是巴国作品,《海内经》是蜀国作品,《五藏山经》是接受巴蜀文化以后的荆楚地区作品^[9]。

很多研究《山海经》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海内经》的一段记载: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有国名曰流黄辛氏(郭注:酆氏也),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尘土(郭注:言殷盛也)。有巴遂山,澠水出焉。^[10]

任乃强先生从中发掘出如下信息:巴族是伏羲氏之后,自太皞下传三代人,便形成为巴族。咸鸟的“咸”字,就是古代咸味的本字,与盐(具体说与巴东盐泉)有密切联系。由伏羲下传三四代,在中原华夏族黄帝、尧、舜之前,那时已有巫载国,巴国却尚未建立。故而“太皞生咸鸟”一句,是表示巴人族源的省文;从“咸鸟”起,才是巴族祖先可知者的开始。他可能是为巫载国运盐行销的商民,故被称为咸鸟。其后段“流黄辛氏之国”,东晋郭璞和清代阮元都说是《海内西经》所谓“流黄酆氏之国”的重复,“酆氏”与“辛氏”是同族分离的两个氏族,分别代表巴族和巫载民族。“流黄酆氏”就是指的巴国都邑酆都(《华阳国志》作“平都”),而“流黄辛氏”指的是巫载民经营盐业的辛苦。“巴遂山”是巴国的山,澠水即金沙江,长江四川段的旧称,巴国正是沿这条河发展起来的。

巴族未建立国家以前,其部落核心在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境内),时间在夏代,经济生活是捕鱼和为巫载运销食盐。当云梦故地为后羿所占后,即《元和郡县志》所说“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因曰巴陵”^[11],巴人逃避到巫山地区来,依附巫载,为其开展上游地区的盐业。其时间在夏殷之间,可能有几百年巴人都居住在巫峡地区,为巫载服务。那时巴巫的食盐,已上销到整个四川盆地。由于巴族运盐功大,巫王才允许后照率族定居到鱼国(今重庆奉节县)之西的故陵巴乡(今重庆云阳县故陵镇),成为巫载的附属部落,时间大约在殷代中叶。巴族在这段时间,发现了所属境内的水下盐泉,创造掘井取水煮盐的技术,逐渐强盛起来。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巴国是以国王身份(“友邦冢君”)领兵参加的,发挥了仅次于周师的战斗作用,“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12],因而取得赐姓姬氏、列为子爵的荣宠,巫载(儵国)、鱼国与丹阳人(丹山南麓之民)均成为依附于巴

国的部落。

战国之世,趁着秦灭巴蜀之机,楚国出兵沿郁山(在今重庆彭水县郁山镇)循乌江占领了枳邑(今重庆涪陵区),自枳以下沿江诸城,如平都(今重庆丰都县)、临江(今重庆忠县)、朐忍(今重庆云阳县)、鱼复(今重庆奉节县)与巫山的全部巴东盐泉,尽入楚国版图。楚国并在巫山和枳邑驻有重兵,抵御秦人,时间在楚顷襄王初年。秦遣大将白起进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截断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与巫盐的水上运道,楚军崩溃,楚顷襄王东奔陈邑(今河南淮阳县)。秦取鄢(今湖北宜城县西南)、郢,烧夷陵,使巫郡失去后援,成为一座孤城。在这种情况下,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蜀郡郡守张若率军轻易攻下巫郡,秦以鄢、郢、夷、巫诸地置南郡。明年,楚襄王纠合十万之众,打回郢来,宜都、西陵(夷陵)、秭归、巫山、鱼复、朐忍、临江、平都、枳、郁山等沿江十五邑人民纷起响应。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歌颂巫山神女朝云暮雨会襄王于阳台,便作于此时。神女乃是巫盐的象征,其间大有深意存焉。

演绎着巫山神女同样浪漫情怀的还有盐水神女与巴族领袖廪君的故事。《后汉书》载:

(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今湖北清江)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今湖北恩施市),四姓皆臣之。^[13]

这条盐水,就是今天的建始河,由湖北建始县南流汇入清江。远古以来一直有条交通大道,自巫山县治始,经大庙坝(今巫山县大庙镇)、大(dài)溪沟(今巫山县大溪镇),翻山越岭抵达建始,沿建始河南下进入恩施盆地,那是古代专门运输巫盐的“盐道”,故被称为“盐水”。

对这段文献,任乃强先生作如是理解:“盐水有女神”,显然是用宋玉《高唐赋》的成法,以巫山神女来比喻食盐的魔力,是表示巫山地区的盐商招诱廪君,劝他依附巫山,吃巫盐。“盐神暮辄来取宿”,亦是《高唐赋》神女自荐枕席的手法,表示巫盐仍自远销而来。可知巫山载族企图联合廪君叛楚,恢复巫载故国。廪君为了食盐,曾与巫人联合,大约周旋了十余年时间。当楚襄王从陈国起兵十万回来争夺巴东盐泉时,廪君奋起附楚,破灭

了载民(射杀盐水神女),夺回秭归、巫山等沿江十五邑,使楚国复兴。秦灭巴、楚后,以郁盐领域为黔中郡。巴国灭亡后有一部分人避居此地,依楚抗秦。直到楚国灭亡后,他们作为黔中郡民仍自保持着巴人旧俗,这便是现代的土家族。^[14]

袁珂先生集毕生精力关注中国神话,是《山海经》研究的权威。其《山海经校注》、《山海经全译》二书,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得益彰,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目的、不同角度的学者各取所需的价值选择。大凡初涉《山海经》,必从《全译》入手;援引《山海经》文献,必以《校注》为准,这似乎已成为《山海经》研究中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袁珂先生对《山海经》的校注,依循传统注疏之学的路数,引经据典,披露了许多远古巫山的逸闻佚事,如瑶姬神话、禹攻云雨、巫咸国、巫载国、孟涂莅讼、夏耕之尸、灵山十巫、巫山黄鸟、诸巫活冥窳(yà yǔ)等等,有助于学者理解《山海经》原文,准确认识巫山的历史文化积淀。即如《山海经》的注释、翻译,绝不仅仅是文字训诂,扫除阅读障碍而已,尤重功底,忌天马行空,牵强穿凿,而多所发明,亦多所创新,殊非易易。

试举一例:研究巫山上古历史及中原文化因素的融入,学者们多引用《山海经·海内南经》“孟涂如巴莅讼”的资料,其中“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一句,袁珂先生直接译为“夏启王的臣子叫孟涂的,在巴地作巫教主”^[15],出语不凡,简洁利落,体现了先生对古代社会、宗教、风俗高屋建瓴的认识。

类似的见解在袁珂先生《山海经》研究著述中屡见不鲜:“中国古代原始的多神教并没有特殊的名称,大都以介乎人神之间、既代表神也代表人的巫师活动为其中心内容,如果要勉强名之,只有称为‘巫教’才比较合适。然而并无此称,因为它只有神祇的崇拜而没有教义。它总是以巫师为中心而举行各种宗教活动。”^[16]《山海经》本来是古代巫师的口传而题以大禹、伯益的,禹本身就是巫师,是巫师的头子——巫教主而兼酋长的身份;禹的儿子启三次乘飞龙到天帝那里去做客(《山海经·大荒西经》);启的臣子孟涂“司神于巴”,能凭血衣断案(《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明他们都具有巫师的形象,是一个业巫的世家。

三位先生对《山海经》的研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自有后来者发扬光大,踵事增华。比他们略晚,董其祥先生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对“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鳌,乘鳌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探索巴族的世系、部族及其原始活动区域,指出:“巫诞”即“巫蠶(dàn)”,就是古代居住在巫山地区的巴蜒(dàn)族。这一带地方古称“於(wū)中”,楚国在此置巫郡,汉代改为武陵郡,“武陵”就是巫山,泛指今鄂西、湘西北和川东(今为渝东)一带高山峡谷区域,也是廪君族的故乡。《山海经·大荒经》对于巫山的记载有五条,《海内西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还有巫彭、巫咸、巫载等记载,其地望大约也在巫山一带。可知《山海经》的作者对巫山地区的部落是很了解的。《海内西经》所载的群巫就是灵山“十巫”的一部分;其地指明在开明东,即群巫居处和升降的地方。开明无疑就是蜀之先世荆人鳖灵所建的开明氏王朝,他的东面当然就是今巫山山脉所经之地,这就是《山海经》中所谓“日月所入”、“(群巫)从此升降”,或“(群巫)所从上下”之所,也是“百药爰在”、仙人采药的好地方。而三苗之东,即今甘肃东南,正是大巴山、巫山地方,即古巴族巫蠶活动、聚居之所,也就是历史上所谓“商於”、“黔中”之地。在春秋以前,江汉流域曾有越人居住,称为“扬越”、“夔越”,其地正在夔巫之东,地理位置与《山海经》所记相符。^[17]

(二) 盐业史研究

以任乃强先生为代表,非常强调食盐对远古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诸多论述,切中肯綮,往往发人所未发。盐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人体如果没有摄入足够的氯化钠,不仅浑身乏力,手脚酸软,而且必定体质孱弱,病入膏肓,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与生活。人们可以没有吃和穿,也可以没有铁和牛,但绝对不能没有最低限度的食盐,这种需求在远古物质文化水平低下的时代尤为显著。因此,凡是“最早被人类发现的地面盐泉区,也就是人类文化发育最早的地区”^[18];“巫溪县的宝源山、彭水县的郁山镇两处,皆有盐泉从山麓陆地涌出。这样的盐泉,人类发现得最早,因而由它所形成的文化核心也最早”^[19];“巫溪盐泉不但是上古时代创造巫载文化的唯一条件,而且也是保持这个边区地方繁荣的主要力量”^[20]。这些精辟的论断,深刻地启发了后代学人,沿着这一致思路将研究工作推向更加深入。

三峡本土学者亦颇关注盐业史研究,纷纷瞄准大巫山盐泉与三峡区域社会的发展。管维良教授20世纪60年代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一直在鄂西地区从事三峡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大量出土文物的清理,证实以巫山、大巴山为主要山脉的巫巴山地是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它直接孕育

了诸巫部落、大溪文明及彭(今湖北房县、谷城县一带)、绞(今湖北郧县西北)、濮(今湖北石首市)、庐(今湖北南漳县东)、糜(今湖北郧县)、鱼(今重庆奉节县)、儻(shū 今重庆巫山县)等国文明,并成为巴、楚民族以及巴文化、楚文化的起源地。巫巴山地荣称南方文明之源,是当之无愧的。^[21]

其中巴族、巴国的盛衰兴亡直接系于大巫山盐泉。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命运与食盐有如此休戚与共的关系,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因为食盐而像巴族、巴国那样在古代政治舞台上卷起了漫天风雨。这是历史的造就,非当时君王主观意志所能左右,亦非后世儒生向壁虚构所能得来。

巫山地区拥有宝源山、郁山、盐水三大盐泉,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巫咸国、巫载国、神女部赖此而生,并为盐而战。当巫山地区不能承受养育更多的民众时,巴族便逐渐向外迁徙,以盐立国,亦以盐兴国,得盐而兴,失盐则衰,巫盐长盛,则巴族长兴。

尧指挥华夏大军击败三苗南退以后,将自己的儿子丹朱封于三苗故地,作丹水部落的首长,丹水流域已是巫山的边缘了。继尧而立的舜让其子无淫向南更推进一些,进入大巫山地区,即《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说的“载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载处,是谓巫载民”,其可能性是很大的。关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鳌,乘鳌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一段,作者的理解是:咸即盐,咸鸟即盐鸟,即负盐之鸟,巴人驾着装载巫盐的舟船,驾轻就熟地在江河之上像鸟一样快捷如飞地行进,故被称为“咸鸟”;“乘”是乘载的乘,为治理之意,即治理乘载之事,可解释为管理运盐之人;“后”即首领,后来引申为国王,“照”或许是“灶”字的讹写,后灶,即管理盐灶的头领。三位巴人首领的名称,明确显示巴族的起源和初兴与盐直接关联着。此时的巴已不再是一个无名小氏族,而是从事煮盐、运盐、贩盐,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名有姓,自称为“巴”的部落了,“始为巴人”意味着巴部落之称得到巫山诸部的认同了。由于贩盐运盐的特殊营生使他们对大巫山周围了如指掌,再远一些也不陌生,在巫山地区日益不能养育更多部民的情况下,他们便逐渐向外迁徙了。大约在殷商时期,亦因巫山地区狭窄拥挤,鱼鳧巴族举族西迁,沿长江而上,折转岷江到川西,战胜柏族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蜀国——鱼鳧蜀国,定都于今广汉市三星堆,筑鱼鳧城。到武王伐纣,牧誓八国之中,蜀国位居前茅,仅次于庸而排名第二,唯一能解释的原因是他们垄断了巫盐对川西的贩运与销售,

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并借此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而专门从事巫山与汉中盐运业务的巴人弓鱼部,一边向西推进,一边继续从事巫盐贩运,以盐致富,以盐自强,很快在汉水上游站住脚,后来在关中地区建立了彊(yú)国。至于武落钟离山白虎巴人五姓并非土著,而是从巫山迁来。廩君是灵君的讹写,当地近楚,受楚的影响,楚呼巫师为灵君,所以廩君就是神巫兼首领的意思。公元前 611 年巴国参加灭庸之战,分得鱼邑和庸国西部领土,包括今巫溪、奉节、巫山等地,巴国遂拥有宝源山盐泉,至此巴国垄断了全部巫盐的生产和销售、运输。巴国败亡,五姓东归,许多部民广泛分布在大巫山地区,就民族而论,则皆属白虎巴族。历史的轮回,又使他们回归故里,向盐泉靠拢,仍操旧业,以使自己的民族习性顺利延续下来。

居于大巫山中的白虎巴人有鱼盐之利,可通过制盐、运盐和贩盐取得较好的收益,加之外界战乱频繁,因此他们千百年来便不再外迁,而是围绕三大盐泉生息繁衍,发展部众。由于唐末五代山外汉人大量进入白虎巴人后裔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客家”;与之相对应,宋代的官方文件逐渐有“土家”之称,以至于巴人以“土”为号,这就是今天的土家族。^[22]

食盐不仅在远古民族盛衰、国家兴亡过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汉代盐业管理制度逐渐完备之后,还在巫山留下了实实在在的遗物,提供了历代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因反对王安石(1021—1086)变法,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以纂修《神宗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23]获罪,被贬黔州(今重庆彭水县),改徙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宋徽宗即位后,“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24],竭力调和变法派和保守派的矛盾,持中治国,先前被贬谪的人士俱被朝廷召回。在这种情况下,建中靖国元年(1101)春,黄庭坚蒙赦东归,自戎州顺江东下,途经巫山,其堂弟黄叔向(字嗣直)正摄县事,兄弟久别重逢,遂在巫山县衙小住,见堂下汉代大铁盆,特撰《盆记》以纪之:

《汉盐铁盆记》,在巫山县。黄太史石刻云:“余弟嗣直来摄邑事,堂下有大盐盆,有款识,盖汉时物也,其末曰‘永平二年’。”^[25]

70 年后,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于乾道六年入蜀任夔州通判,

十月二十四日(1170年12月3日)抵达巫山县城,在县衙中再见此盆,留下了更详细的资料:

(巫山)县廨有故铁盆,底锐似半瓮状,极坚厚,铭在其中,盖汉永平中物也。缺处铁色光黑如佳漆,字画淳质可爱玩。有石刻鲁直作《盆记》,大略言“建中靖国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摄县事。予起戎州,来寓县廨。此盆旧以种莲,余洗涤乃见字”云。^[26]

古人多种金石著作如〔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〇八),以及〔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十二)、〔明〕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卷五十二)、〔清〕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六)诸书指出,所谓“其末曰‘永平二年’”均为“永平七年”之误:

《汉盐铁盆记》,黄太史石刻云“堂下有大盐盆,有款识,盖汉时物也,其末曰永平二年”即巴官铁盆铭,永平七年。^[27]

最先确认该盆为汉代文物并披露14字内容的金石学家是南宋赵明诚(1081—1129),其《金石录》考证说:

右《巴官铁盆铭》,云“巴官永平七年,三百五斤,第二十七”。前代以永平纪年者凡五:汉明帝、晋惠帝、后魏宣武、李密、伪蜀王建,惟明帝至十八年,其他皆无及七年者,以此知为明帝时物也。此铭王无竞见遗。^[28]

题下小注:“此盆色类丹砂。鲁直石刻云:‘其一曰秦刀,巴官三百五十戊,永平七年第二十七西。’余绍兴庚午岁亲见之,今在巫山县治。韩晖仲云。”这段文字也出现在《李清照集》中,一字不替,题为《汉巴官铁盆铭跋尾注》^[29]。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赵明诚死于建炎三年(1129),而绍兴庚午是绍兴二十年(1150),显然“亲见”巴官铁盆铭的不是赵明诚本人,那么这段跋语出自何人之手呢?当今学术界或以为李清照作,或以为韩晖仲作。笔者以为,赵明诚、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琴瑟和谐、比翼双飞的第一伉俪,夫妻俩均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为杰出的考古学家,一为著名的文学家,《金石录》实为两人合作的结晶。古人记载:“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

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30]清代“神韵派”大师王士禛(1634—1711)更明确说:“赵明诚与其妇李易安撰《金石录》,其书最传。”^[31]可见《金石录》也凝聚着李清照不少心血,关于《巴官铁盆铭》的跋语出自她的手笔是极有可能的。

半个世纪以后,南宋另一位金石学家洪适(1117—1184)透露《巴官铁盆铭》是16字而非14字,遂使波澜再起:

巴官三百五十斤,永平七年第二十七西。右《巴官铁盆铭》十六字,显宗永平七年造。建中靖国初,黄鲁直自戎州东归,厥弟叔向摄邑巫山,有大盐盆积水堂下,以植莲芡,鲁直去其泥而识之,其文铸出铁上,故虽有发笔而势不可纵,人或指以为篆。首行惟有一字如“乙”而反,最后一字如“西”而有连笔。鲁直以为前“刀”而后“酉”,亦谓之秦篆,又以“斤”为“戊”,皆误也。^[32]

赵明诚、洪适订正了黄庭坚的舛文,但也还有一些新的问题,留待后世学人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实,黄庭坚、陆游等人所看到的巫山县衙大铁盆,是东汉永平七年(63)由巴郡铸造运去的煮盐盆,即《史记》所谓的“牢盆”。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后,“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33]。巫山存者即是其中之一。

当代学者继往开来,指出:永平七年(63)所铸煮盐大铁盆留存于巫山县衙内,说明早在东汉初年,古巫县城区或近郊,就已经有人在使用从官府买来的煮盐大铁盆煮制食盐,亦或有贫民受雇煮盐^[34],由此可以推想当时巫山制盐业已相当发达。

对巴官铁盆铭文的考释依然是激动人心的课题。由于原物已不复存,只在文献中留下黄庭坚发现它的概况和陆游等人的描述,人们大多以为其器已亡,其铭已没,遂衍生出关于铭文及相关名物制度的诸多考释,豕亥鱼鲁,歧义迭见,而今人对它的引证和阐释亦多猜度之辞,屡有讹误。有鉴于此,程地宇教授对巴官铁盆及其铭文做了系统的考释,涉及铭文称谓、“牢盆”含义(廩食说、价值说、工食说、盆名说、坚牢说),以及铭文字体、“巴官”界说、“刀”与“乙”、“斤”与“戊”、“第廿七”、“西”与“酉”等字的考辨,确认“牢盆”既是盐业生产的主要工具,又是官方权力的物化象征。然则光武中兴,改盐铁官营专卖制为民营征税制,何以汉明帝永平七年(63)官



方还在铸造铁盆呢？对此，作者的解释是：刘秀虽改制，但东汉初年以牢盆为核心的管理方式并未废弃。在官营专卖制下，牢盆的功能是以此垄断生产，并以产定值，支付工价；而在民营征税制下，牢盆的功能则是从生产环节上予以监控，以产定值，征收盐赋，防止偷税漏税。但盐禁既久，一旦开放，势必出现纷繁情势，“巴官铁盆”现身于南郡巫县，就透露出些许微妙的信息^[35]。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巫山熬盐的卤水从哪里来？答案是：大宁河栈道运输。

到小三峡观光的游客都会发现：大宁河西岸的峭崖绝壁上，有一个个排列均匀的小石孔，20厘米见方，深约50厘米，孔距1米多，不少地段上下两排，呈品字形，地势险处3排，缓处1排，排距1.7米，与大宁河水面大体保持平行，从龙门峡口向北延伸，经大昌古镇、巫溪县城、宁厂古镇直达陕西镇平县母猪洞，向东绵延到湖北竹溪县桃园河，西北逶迤至重庆城口县亢河及陕西省小榆河一带，纵横400余公里，是中国迄今保存最完好、里程最长的古栈道遗迹。有心人做了统计，共有栈道孔6888个。2000年4月20日，原巫山县旅游局局长龚源鼎同志组织人员对小三峡古栈道进行实地考察，得出准确数据：从龙门峡口至涂家坝50公里长的小三峡内，古栈孔共4288个，其中龙门峡993孔、巴雾峡1092孔、滴翠峡2203孔。从分布情况看：单排孔3416个，占79.66%；双排孔861个，占20.31%，三排孔11个，占0.03%。^[36]这些数据弥足珍贵，特别是三峡工程完工以后，小三峡栈道很多地段已淹没水下，不再为人所知，因此不少学者在相关著述中都直接引用了这些数据，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那么，这些栈道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一种说法是用于军事，是春秋时期巴、楚、秦三国于公元前611年灭庸时，为运输兵马、粮草而开凿的军事栈道，以后诸葛亮屯兵、北宋平蜀亦曾使用。

一种说法是唐玄宗给杨贵妃运送荔枝。杨贵妃长于蜀中，爱吃荔枝。所食荔枝产于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因荔枝易坏，有离枝一日失色、两日失味、三日色味俱失之说。为了保鲜，当荔枝长到七成熟时，即连根掘起，装载上船，顺江东下，计算好里程远近、速度快慢，确保送达临潼华清宫时恰好是十分成熟。为一人人口福，劳民伤财如是。

宁河栈道的真正功用，学者们经实地踏勘，并运用现代高精仪器全站

仪进行实测,结合光绪《巫山县志》、光绪《大宁县志》的文献记载,确认是凿石钻孔插木桩以架竹笕,将巫溪宝源山盐泉引至大昌、巫山等处煎制,然后运销到沿江各地,因而成就了世界上最早、距离最长的工业管道^[37]。按其主要功能,又可以宁厂古镇后溪河口为界,分为北上段和南下段两条路线。北上段古栈道主要是运盐通道,而南下段则是供架设竹笕管道输送宝源山盐泉至大昌坝及巫山城郊等处煮盐的输卤栈道。由大宁河栈道将宝源山盐泉输送南下,是巫山县煮盐用卤的唯一来源。从地理位置上看,巫山是巫盐走出宁河峡谷、运往长江流域各地的必经通道,巫山虽不产卤,但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是不可取代的;加之巫溪道路的艰险,卤水自流到巫山要比从巫溪大山深处直接运盐出来方便得多、经济得多。无论从地理环境的客观事实看问题,还是从长远利益想问题,把卤水从宁厂古镇通过竹笕栈道输到巫山县境内,在巫山煮制成盐,然后运往长江流域各销售区,这对古代三峡地区的盐业生产与食盐运销而言,是最方便、最经济的方式了^[38]。而宁厂镇熬制的成品盐则通过大宁河古栈道及其支线运销到大巴山以北的关中地区,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一种最经济的商业生产运作模式。竹笕从栈道遗址上排以吊栈悬索系笕的方式在崖沿飞渡而过,下排栈孔则是架设供维修人员暂住的“栈阁”遗迹^[39]。

(三) 军事史研究

考察三峡人文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战争非常频繁。三峡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会的枢纽、南北融合的桥梁,各种政治集团都会不失时机把敏锐的触角伸入三峡。这种独特的战略地位吸引着历代雄师健将在这里叱咤风云,斗智角力,演绎出辉煌灿烂的军事文化。从巴人兴周灭商、侵楚伐庸,到刘邦还定三秦、终执牛耳;从公孙述据关筑城、扼拒天汉,到刘备兵败彝陵、永安托孤;从王濬楼船下江南,到杨素舟师取金陵;从宋末旷日持久的抗元保卫战,到清中叶风起云涌的白莲教起义;从万县“九·五”惨案引发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最终收复汉口、九江英租界,取得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胜利,到工农红军、游击队转战川鄂边,前仆后继开创革命事业,血染战旗红……三峡以其丰富多彩的战争,一次又一次被载入中国史册。每当中国政局动荡、风云际会的时候,都会在三峡地区掀起轩然大波,秦汉之际、魏晋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都在三峡地区卷起了漫天风云;秦朝、西汉、东汉、西晋、隋朝、元朝、明朝的大统一,都是以三峡地区的战争为契机而实现的。战争是

政治的延续,是流血的政治,是交战双方的殊死决斗,是各自政治态势、经济实力、文化水准、民族精神的综合较量。普鲁士名将卡尔·冯·克劳塞维兹指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40]然则战争并不仅仅意味着破坏,也是一种特殊的建设,它强制调整社会关系、政治格局、经济利益、民族关系,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有如凤凰涅槃。斯宾格勒有一句名言:“战争的精华并不在于胜利,而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41]这句话总结了战争与文化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实在是至理名言。不妨这样理解:毁灭是建设的清道夫,战争是新生的助产婆。

巫山由于地处三峡腹心,每一场战争风雷都激荡着它的胸怀,给区域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13 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连年深入三峡地区,兵锋所向,“远际瞿塘、夔府、巫山之界,所征无敌,所向无前,如入无人之境”^[42],欲直取南宋江南半壁河山。在四川“飘若风雨”、“亡形已具”的严峻形势下,余玠(?—1253)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夔州路转运使,建立起庞大的山城抗战体系。其中三峡地区有万州天生城(在今万州区近郊)、梁山军赤牛城(在今梁平县西 10 公里)、夔州府白帝城(在今奉节县东 10 公里)和大宁监天赐城(在今巫山县龙溪镇天城村)4 处城防。夔州路安抚使徐宗武于景定三年(1262)十一月亲自踏勘选址、创筑天赐城,第二年四月初一日(1263 年 5 月 9 日)告成,特撰《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如实记载了天赐城的创修经过和抵御蒙古入侵的作用,“商贾往来,居民还定,耕屯日辟,跨两冬而虏不敢窥”^[43],由大宁监执事勒石。由于历史沧桑,时势移人,该碑长期埋埋地下,清代才由农夫掘地挖出,至今仍存天赐城遗址东门松树林中,成为宋蒙三峡军事史的珍贵物证^[44]。

元末,红巾军领袖明玉珍(1329—1366)攻入四川,在重庆建立了大夏政权,拥有全川、陕南、滇北之地。明玉珍死后,其子明昇(1356—?)幼龄执政,权臣误国,同室操戈,给新兴的明王朝以可乘之机。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派兵分南、北两路进攻大夏,统一全国。北路军以颍川侯傅友德(?—1394)挂征虏前将军印,运筹帷幄,暗度陈仓(今陕西南郑县境),攻入川西,一路凯歌。南路军统帅是中山侯汤和

(1326—1395),挂征西将军印,却指挥不力,表现欠佳,致朱元璋亲信大将康茂才(1314—?)在攻打金沙滩(今巫山县大溪镇)的战斗中被流箭射死。根据官修《明实录》、《明史》等书的记载,康茂才随大将军徐达(1332—1385)北伐中原,洪武三年八月己未(1370年8月24日)病死于陕州(今河南陕县),朱元璋令归葬南京幕府山,并亲自撰写祭文表示哀悼,所以学术界一般将康茂才的生卒年限定为1314—1370年。然而地方史志文献则表明,康茂才是明朝平夏之役的干将:

大溪,(巫山)县西南六十里。古名金沙滩,即明汤和征明昇屯兵处。峡口有石,刻云:“康茂才行兵到此。”字现存。向有康公庙,今废。^[45]

明康茂才墓,在(巫山)县西南九十里。官大将军,洪武初领兵征明昇,被流矢中伤,卒,葬于金沙滩,即今之大溪口也。碑石现存。^[46]

《县志》所说的“碑石现存”,即《府志》记载的“峡口有石”,但文字著录有误,当为“皇明康茂才进兵处”8字,碑缘有“大溪口”3字,字径20厘米×30厘米,原存大溪镇军营村长江北岸堰子崖南麓,现已搬迁到镇上文化广场。这些文献和实物说明,康茂才可能确曾参加平蜀之战,其生卒年代应当改写为1314—1371年。^[47]

明军出征大夏还给巫山留下了另一处重要遗迹:他们并没有取道长江干流沿巫峡进兵,而是绕道巫山县城东北50里的山间小路,来到一条湍急的河流前。只见高岸峡谷,绝壁如削,河水咆哮,深不可测。明军骑兵分为两队,小心翼翼渡过了河,继续前行。从此,这条河开始称为“马渡河”:

马渡河,在(巫山)县东五十里,其水难济。前明洪武间进取明昇,马骑而渡,遂名。^[48]

崇祯年间(1628—1644),马渡河始设上马、中马、下马三个关隘^[49],如今的马渡河“小小三峡”,则已成为蜚声中外的风景名胜区。

时至明中叶,风起云涌的两次荆襄流民起义打乱了川、楚、陕、豫四省社会秩序。成化二年(1466)六月,石龙(号石和尚,?—1466)率领的义军转战三峡地区,攻占巫山、大昌县城,于洋(又作羊)溪河杀夔州通判王祯